



山城那些台阶

——记“时代楷模”渝检护“未”团队代表



渝检护“未”团队代表在一起研究涉未案件。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亚

山城多台阶。爬坡上坎，走街串巷，满眼皆是。有的长满青苔，有的磨得发亮，有的蜿蜒入江，有的没人巷陌。重庆许多检察院门口，也有几十级台阶。它们见过低垂的脑袋、绝望的眼泪、颤抖的肩膀，也见过一些别的——热乎的小面，挨着坐一下午的小小身影，太阳慢慢从这头

搬到那头。有时候，一个孩子的人生拐弯，就发生在某级台阶上。2004年，重庆大渡口。一个孩子站在被告人席上说了一句话，让一群检察官坐不住了。他们走出检察院，走进学校、社区、大山深处，走进那些从没想过会有人来的地方。然后，他们在孩子们身边坐下来。一个，接着一个。这一坐，就是22年。

台阶上坐着两个小小的身影

“我坐在那儿，心里慢慢透亮起来——未检检察官到底是个什么官？案子结了，事儿就完了吗？不是的。这是国家交到你手里的孩子，你得看着她们好好长大。”

2018年10月的一个傍晚，太阳正落山，重庆市检察院第三分院的台阶上，坐着一大两三个小身影。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李非白左挨着一个10岁的女孩，右挨着一个5岁的女孩。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就这么并排坐着，呼噜呼噜地吃着面。两个小时，两个孩子的亲属把她们扔在检察院大厅，扭头就走了。李非白没来得及反应，只看见她们站在那儿，大的低着头，小的抱着个布娃娃，眼睛不知道往哪儿看。她把俩孩子领到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天快黑了，便去买了三碗面，回来的时候，俩孩子还站在原地，动都没动过。“走，咱们坐台阶上吃。”她说。那是2018年初，一场车祸夺走了两个年幼孩子和17岁姐姐的父亲，而她们的母亲早已离世。好不容易协调了一位亲属愿意当监护

人，李非白却发现对方可能存在侵占赔偿款的风险，便建议暂停发放赔偿款。于是，这俩小的，被“扔”在了检察院。李非白不知道要陪她们坐到什么时候，只知道从今往后，这三个孩子，她得管。后来跟人讲起那天，她说：“我坐在那儿，心里慢慢透亮起来——未检检察官到底是个什么官？案子结了，事儿就完了吗？不是的。这是国家交到你手里的孩子，你得看着她们好好长大。”这一看就是七年。在检察院和当地政府、司法、民政等各部门的接力守护下，三姐妹走出了阴影，大姐结婚生子，妹妹们也顺利升学就业。孩子们亲切地叫李非白“检察官妈妈”。前不久李非白去家访，看见她们阳台上摆满了绿植，还养了小猫小狗，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又回到了她们脸上。

走到孩子的家门口，走到孩子的心里去

有人问他，这么多孩子，你帮得过来吗？他没回答，只是穿上底都快被磨平的鞋，往下一户人家走去。

检察院门口的台阶并不高。但有些孩子，一辈子也走不到这台阶跟前，得检察官自己，走到他们家门口去。起因是在监狱服刑的张某，给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未成年人检察部检察官吴波寄了一封信，只有短短几行字：“我和妻子都坐牢，家里两个孩子没人管，怎么办？”吴波当时气得把信拍在桌上，心想这个曾经拐卖孩子的罪犯，想过别人的孩子吗？可气归气，第二天一早，他还是叫上车，往大山里开。吴波第一次去那户人家时，开了200公里山路，最后一段得走着进去。太阳把地晒得发烫，两个小孩穿着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厚衣服，浑身的馊臭味隔着老远都能闻到。爷爷躺在床上，一边咳一边抹泪：“吴检察官，你看嘛，我怎么这么大了，这两个孩子可怎么办哟……”

级台阶。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孙文静第一次带那个“黄毛”小子来的时候，他蹲在台阶上，不肯进去。16岁的他，偷了好几次摩托车。按照常规的路子，送进去判了就算了。可孙文静看着他那张脸，想起师父吴健临终前递给她的那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142个名字，还有他们的情况。吴健说：“文静，这是我帮教过的孩子，一个都没有再犯过。你替我把他们都看好了。”他是2022年底走的，肝癌。最后那阵子，每天吃十几种药，副作用上来又吐又拉，有时候开车去提审，路上得停三四次。同事劝他回去歇着，他就摇头：“那些孩子还在等我。”孙文静想起师父的话，蹲下来问：“不想进去？”“不想。”“那咱就坐会儿。”两个人就在检察院门口的台阶上坐着，聊了很久。后来，孙文静带着这个孩子去搞帮教活动，去爬山，去当志愿者。周末的时候，她把自己儿子也带上。儿子攥着巧克力，怯生生地递给蹲在角落的“黄毛”。后来俩孩子在草地上滚成一团，分不清谁是检察官的孩子，谁是帮教对象。就这样，她组建帮教团队，帮助了14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

2022年8月，重庆山火现场，“黄毛”骑着摩托车一趟趟往火场里冲，送物资、救伤员。孙文静在朋友圈看见他灰头土脸的背影，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师父，您看见了没？这块石头，真的被晒热了。

一句锥心之问，二十二年的回答

22年过去了。那个15岁少年的那句锥心之问，从一个人的心里传到了一群人的心里，“莎姐”青少年维权岗从1个拓展到45个，成员发展到目前的500余人，最后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回响。

22年前，也有一个孩子，走上了法院的台阶，站在被告人席上。15岁，不到一年时间抢劫了41次，最多一次抢了600元，最少一次只抢了5角钱。法庭上，他没哭，但说了一句话：“爸妈离婚没人管我！被人欺负没人帮我！现在我犯了错，你们都来审判我！”那天晚上，当时还是大渡口区检察院青年干警的梅玫没睡着，心里翻来覆去地想：如果在他第一次犯错前，有人拉他一把呢？就为了这“多拉一把”的念头，梅玫和同事们组建了“莎姐”青少年维权岗，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莎姐”。“莎”是一种草药，能治病，读suō。她们想做的，就是在孩子们还没没人膏肓的时候，把那剂药送进去。面对一个被侵害后应激的孩子，梅玫什么也不说，只是每次都去抱抱她，抱了三个多月，直到孩子临别时

主动抱住她。那一刻她意识到，光靠法律是不够的。于是，她翻出落灰的心理学书籍，考取了证书。“想真正走到孩子心里去，还得靠这个。”现任大渡口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她指了指自己的心口。22年过去了。那个15岁少年的那句锥心之问，从一个人的心里传到了一群人的心里，“莎姐”青少年维权岗从1个拓展到45个，成员发展到目前的500余人，最后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回响。2025年8月，中央宣传部授予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时代楷模”称号，褒扬其为“德法相伴、倾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这是检察机关第一个获此荣誉的集体。可他们自己觉得，没那么复杂。不过是看见孩子坐在台阶上的时候，走过去，挨着坐下来。

为众人抱薪者的孩子，我们来守护

那一刻，孙文静仿佛又看见了检察院门口那十几级台阶——那些蹲着不肯进去的孩子，那些聊天开解的午后。她和同事们迅速启动司法救助，推动认定谭军“见义勇为”并获得赔偿，孩子们上学的问题也解决了。

2024年1月，九龙坡区检察院的会议室里，孙文静的一连串提问，像重锤一样落在大家心上：“这么嚣张的未成年人还要不要再给机会？”“只有一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另外两人就一放了之吗？”“伤者的孩子又有谁来保护？”2023年8月，出租车司机谭军深夜下班，看见三个年轻人正在偷车，他冲上去阻止，遭对方殴打，致股骨粉碎性骨折。经鉴定，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伤残十级。孙文静和同事们坚持分级处置：对未满16周岁的两名涉案人，依法向他们的父母送达督促监护令；对已达刑事责任年龄的大潘，依法提起公诉。大潘被判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后，孙文静写信鼓励他：“孩子，相信你只是

一时迷失，好好改造，未来依然可期。”案子结了，事儿没完。孙文静始终记得谭军家的场景：墙壁斑驳脱落，谭军虚弱地躺在沙发上。两个孩子——哥哥上初一，妹妹读小学四年级，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如今，因为经济压力，谭军正考虑让他们回老家上学。两个孩子仰着脸问她：“姐姐！爸爸妈妈明明做了好事，为什么还不被人理解？现在，爸爸还要送我们回老家读书！”那一刻，孙文静仿佛又看见了检察院门口那十几级台阶——那些蹲着不肯进去的孩子，那些聊天开解的午后。她和同事们迅速启动司法救助，推动认定谭军“见义勇为”并获得赔偿，孩子们上学的问题也解决了。为众人抱薪者，怎能让他冻伤于风雪？

让台阶更稳一些

那是一个“笨活儿”，也是一场硬仗——要把成千上万条数据一条条比对，要把几十个部门一家家协调。平台建起来后，把1万多名高风险人员挡在了校门外。

从台阶上站起来的人，才最懂得台阶的意义。他们知道，光有一个人坐在孩子身边不够，得让那级台阶，本身就稳一些。让每一个走过来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下去。重庆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龚珊推动建立了全国首个省级教职员入职查询平台，参与创建20余项未成年人帮教救助保护机制。那是一个“笨活儿”，也是一场硬仗——要把成千上万条数据一条条比对，要把几十个部门一家家协调。平台建起来后，把1万多名高风险人员挡在了校门外。后来，这个平台被写进了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那个淡蓝色的“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走进去，卡通云朵、柔软沙发、毛绒玩具，取代了冰冷的询问室。一个遭受侵害后拒绝沟通的女孩，在这里经过五次心理干预后终于敞开了心扉，检察机关得以高效收集案件关键证据，从立案到公诉仅用了42天。更重要的是，女孩走出了阴影，重返校园。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未成年人检察部检察官唐焕然，当过兵，驻守过新疆。转业回来，他把卫国戍边的那股劲儿用在了网络空间。为了给子追索一笔心理康复费，他啃了几个月资料，开了十几场论证会，硬是闯出了重庆市第一例网络侵害公益诉讼。有人问他：“你一个当兵的，怎么搞起这些来了？”他说：“在部队的时候，守在边境线上不让坏人进来。现在守在网络边上，也是一样的。”

主任王莉研发了“家庭成长环境风险防控”数字模型，在重庆全市推广，对那些监护不到位、孩子行为异常的苗头实现了数字化预警。她说，等案子发生了再管，就晚了。他们做的这些事，孩子们看不见。但孩子们坐的那级台阶，因为他们，稳了一些，暖了一些。如今，渝检护“未”团队代表们的办公桌上，堆放着最珍贵的“勋章”：有出狱少年寄来的结婚请柬，有被救助女孩手绘的检察官画像，还有数千封孩子们的真情来信。“虽非骨肉亲，依然父母心。”无论案内案外，他们始终以父母之心，竭尽所能，只为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在黑暗中独自哭泣。山城多雾，但太阳总会升起。那些曾经坐过台阶的人，有的已经站起来，走远了。但总还有新的小小身影，等着下一个愿意挨着坐下来的人。



相关报道



赵玉芳代表

刘希娅代表

张莉代表

□本报全媒体记者 郭荣荣 崔晓丽 吴贻伙

“最初接触到渝检护‘未’团队代表时，我是有些意外的。”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副校长赵玉芳坦诚地说。在她以往的认知里，检察工作多与惩治犯罪、法律监督相关，这个团队让她看到了超出法律条文之外的温情与担当。

这份珍贵的“超出”，正是“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下称“渝检护‘未’团队代表”）的动人之处。近日，三位全国人大代表分享了他们关于这支队伍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观察与思考。

“要对一时走错路的孩子有信心”

渝检护“未”团队代表令赵玉芳代表感触颇深的一点在于，“他们看到了未成年人还有很长的未来”。在赵玉芳代表看来，那些受到帮助的孩子会真切地感受到，检察机关给予他们的，不仅是法律的裁决，更是对未来的托举。赵玉芳代表认为，渝检护“未”团队代表的精神内核是，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不是一件事、不是一瞬间，而是着眼他们的全面发展，“环境和人是相互塑造的，我们要对一时走错路的这些孩子有信心，相信他们可以重返社会，回归到正确的人生轨迹中”。

但信心之外，更需要路径。赵玉芳代表呼吁，要建设专业性强的社会组织、培养专业社工队伍，为未成年人保护搭建坚实的行动载体。她指出，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和担当。谈及重庆的实践，赵玉芳代表透露当地正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构建，“认识到问题，就是改变的开始。从点滴行动中着眼未来，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做得更实更深——这正是我们正在走的路”。

从“几家奔走”到“众人拾柴”

“这不仅是对一个团队的肯定，更是对整个重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一次巨大推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学校党委书记刘希娅用“三个变化”概括了渝检护“未”团队代表获评“时代楷模”后给重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带来的深刻变化。首先是观念之变。“当前，‘把孩子的利益放在首位’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刘希娅代表告诉记者，从党政机关到普通市民，从学校老师到社区干部，全社会正形成共识——未成年人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其次是协同之变。教育、民政、团委、妇联等单位与检察机关的配合，从“被动”走向“主动”。刘希娅代表说：“以前可能是检察机关主动去对接，现在越来越多的单位主动找上门，共同商量如何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做得更科学、更扎实。”

最后是辐射之变。刘希娅代表说，渝检护“未”团队代表并未止步于荣誉，而是在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制度上持续深耕。特别是在法治资源薄弱的偏远乡村，通过团队辐射带动更多孩子享受到了专业司法保护。

展望未来，刘希娅代表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推动建立更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支持体系，让“六大保护”形成闭环；二是将违规招生等教育领域突出问题纳入检察公益诉讼范围。

把“父母之心”化作制度的“最后一公里”

在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电气工程学校党委书记张莉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发生了一场“静水深流”的变革。从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顶层设计，到检察机关制发“一号检察建议”，再到强制报告、入职查询、家庭教育指导等制度入法，一张严密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网”正在织就。

“强制报告解决了一个长期痛点——谁来发现？谁来发声？现在，不报告就是失职，就要追责。”张莉代表还特别提到入职查询制度的深化，“过去我们只查教师，现在检察机关推动查询范围覆盖到所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把‘大灰狼’挡在校门外，这是对孩子们前置的保护”。

张莉代表同时坦言，顶层设计落地仍有“最后一公里”需要打通，“强制报告在一些基层医疗、教育机构还存在‘不敢报、不愿报’的心理，入职查询在民办培训机构、新业态领域仍有盲区”。

对此，张莉代表呼吁，以学习“时代楷模”为契机，推动各项制度从“有”向“优”迈进。“渝检护‘未’团队代表的精神，说到底是一种‘父母之心’——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疼、来护。若全社会皆有此心，每一项规定皆能扎扎实实地落地，那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才能真正从理念照进现实。”张莉代表表示。

从西南一隅到全国视野，从司法实践到顶层设计，三位代表的讲述共同指向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未成年人保护没有“局外人”，当司法温度、家庭责任、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当一项项制度从纸面走向现实，才能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最坚实的蓝天。

正如赵玉芳代表所说：“我们要相信孩子，给他新的环境，给他成长的机会，他将来会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一个守法的、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



2025年5月26日，渝检护“未”团队代表在重庆市北碚区两江名居第一小学开展校园普法活动。